

• 博士(生)论坛 •

司马懿的恩仇观及其复仇行动

付开镜

(广西师范学院 法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司马懿和曹魏皇帝之间没有形成赐恩和报恩的忠诚关系体。在司马懿的眼中,曹氏家族对自己无恩可言,在曹操时代,司马懿种下了复仇的种子。在曹丕和曹睿时代,司马懿为魏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这也只是他作为复仇篡魏的资本。在齐王芳时代,司马懿的复仇心理大爆发,终于走出了篡夺曹氏皇权的关键一步。司马懿的复仇行为对其子孙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同时也夯实了极不牢固的立国根基。

关键词:司马懿;恩仇观;复仇;恶劣示范

中图分类号: K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134(2007)06-0045-04

唐人修《晋书》时,太宗李世民对司马懿的行径极为鄙视,亲自撰写了《宣帝纪》的评语,以痛斥司马懿的篡魏行径:“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1]20-22}

在李世民看来,司马懿受到魏文帝、魏明帝两位皇帝的信任,理应忠心报答知遇之恩,因此,他“前忠后乱”,就是极为可耻的行为。却没说明司马懿“前忠后乱”的原因。

事实上,司马懿对曹氏家族的态度,在其出仕曹操府中的职位前,是“无忠”;在其出仕曹操府中职位时期,是“不敢不忠”;到了曹丕、曹睿时期,是积累篡业资本——“为己而忠”;在齐王芳时代,是“公然不忠”。

忠与不忠,是行为的表象,而在表象的背后,却是司马懿心中的恩仇观念在起作用。

一、司马懿仇恨曹氏之因

恩仇观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价值追求。有恩必报与有仇必报,是人们行世处事的基本原则。从恩仇角度考察:曹操对司马懿有仇而感恩;曹丕、曹睿对司马懿有恩而无仇;曹芳对司马懿无恩也无仇。

司马懿的最初出仕不是自愿。在司马懿的心里,曹操出身宦官之家,卑微且为世人所诟,血统不明不白,不值得他去效忠;也就是因为不愿“曲节”,曹操差一点要了他的

性命。另一方面,曹丕父子对自己有恩,而他也对曹氏政权的稳定立下不可小觑的大功——“你对我的恩,我也已报答”,两两相抵,谁也不欠谁的。所以,司马懿对曹魏政权,没有牢固的感情根基,有的只是他对曹操猜忌的仇恨。这种猜忌之仇,在曹操时代,他只能想方设法躲过猜忌而不敢表现出一丝痕迹;在曹丕父子时代,虽然为曹丕和曹睿对自己信任和重用而消融下去,却不能消掉;在齐王芳时代,这种长存于心中的对曹操的仇恨,遇到机会,就爆发了,进而把复仇心理变成了复仇行动。

司马懿对曹氏的仇恨缘于以下四方面原因:

1. 曹操要起用司马懿,司马懿不愿屈节,装以风疾,曹操暗中派人查看,装出要刺杀他的样子,为他所识破。《晋书·宣帝纪》说:“汉建安六年(201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以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1]2}。

2. 曹操再次征辟司马懿,并派人威胁说:“若复盘桓,便收之”^{[1]2}。司马懿害怕被收,被迫“出山”。但是,心中甚不高兴。司马懿就这样步入仕途。在这一点上,可以拿诸葛亮来进行比较。诸葛亮是刘备三顾之后而“出山”的,从此诸葛亮倍感知遇之恩,为刘备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司马懿的“出山”,却是一种面临灾难的被迫。可以想见,他怎会感念曹操的“恩德”?

3. 传说司马懿有狼顾相。也就是像狼一样,不转动身体而只转动脖子向后看。狼顾相,也就是反相。曹操为此特

收稿日期:2007-11-06

作者简介:付开镜(1966-),男,湖北枣阳人,历史学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法商学院教师。

试了他一次。这在司马懿心中,不可能不是一种奇耻大辱。

4. 曹操对才华出众者虽然任用,却从没真心待之,有过人之才的荀彧,装扮过曹操接待匈奴使节的崔琰,以及清正廉洁的毛玠,都为曹操或杀或黜。对司马懿,他更不放心。曹操警告曹丕,小心司马懿“预汝家事”^{[1]20}。

司马懿虽然对曹氏心怀仇恨,但是,一时间他只能把这种仇恨藏在心底。

二、司马懿避祸与积聚复仇资本

在曹操当政时期,司马懿只能极力讨好曹操以避祸。

初,曹操征司马懿为文学掾。文学掾,是曹操丞相府中属官,主文书校理,权力不大。后来让他与太子曹丕相处,可能曹操想让太子学聪明一点吧,就迁他任黄门侍郎。黄门侍郎一职,即给事黄门侍郎,汉时本为侍从皇帝左右之官。曹操置四人,为侍卫之官,位五品,秩六百石。后“转议郎、丞相东曹掾,寻转主簿”^{[1]2}。议郎,“散骑常侍下,给事黄门侍郎上”^{[1]733}。可见,司马懿的官位又升了一点。东曹掾,是曹操丞相府的高官,典选举。毛玠曾做东曹掾。可能在毛玠被除名后,曹操才用的司马懿。但很快,又转为主簿,后又迁为军司马。在魏国建后,“迁太子中庶子”,成了曹丕身边的人。^{[1]2}

为什么曹操猜忌司马懿,而又不断提升其职务呢?主要还在于曹丕的作用。曹丕一直担心其太子地位,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拉拢一批足智多谋的人才。其次,在于司马懿的小心谨慎。

司马懿虽然看不起曹氏家族,但是,在羽毛尚不丰满之时,却不敢与曹操父子硬抗。因此,历曹操、曹丕、曹睿三朝,司马懿一直在积蓄政治资本,兢兢业业,“夜以忘寝”^{[1]20},屡有功绩。

司马懿曾为曹操提出过四个建议:一是乘刘备立蜀未稳攻之,却为曹操拒绝。《晋书·宣帝纪》:“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1]2}。司马懿此谋甚佳,为何曹操不听其谋?可能是曹操怕后方不稳,也可能是不愿听从他的计谋。二是孙权在受到刘备攻击时,卑辞劝曹操称帝,司马懿乘机拍上马屁,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1]2}。但是,也为曹操所拒。这却表明司马懿的狡诈。他本身不愿屈节曹氏,这个时候,首先提出要曹操做皇帝,不过是急于表白对曹操的忠诚罢了。三是力主屯田,为曹操所纳。但这种建议,并非司马懿的首创。四是在洛阳受到关羽威胁时,司马懿反对迁都许昌,而建议暗使孙权袭击关羽后方,为曹操所纳。其实,当时,蒋济也提出了此计。因此,此计之功并不仅属他一人。

司马懿提出这四项建议,已显示其才能,但其重要目

的还是在于讨好曹操,以便躲过曹操猜忌之祸。

司马懿虽然为曹操所忌,却受到了曹丕的信任。司马懿聪明过人,他知道,在曹操心中,他的命运岌岌可危,只有抓住了太子,他的命运方能得到改观。这一点,他做到了。史称“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1]2}。司马懿因此受到了曹丕的器重。

司马懿献的是什么“大谋”、什么“奇策”?史无明文。如所周知,曹丕的太子地位一度不稳,曹植之聪明,是他心中的芥蒂;而曹彰的威猛,也是他的心病。曹操也一度有立曹植为太子之心。所以,司马懿所献的“奇谋”,必定与稳固曹丕的太子地位深有干系。曹丕后来对宗室禁锢严酷,也有可能和司马懿的“奇谋”有密切关系。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司马懿一方面对曹丕心理洞悉甚清,另一方面,还有不可言传的重大异图——让曹丕视宗室为仇讎,禁而锢之,从而削弱拱卫帝室的力量,以便将来有时机到时,夺取曹氏的天下。以后来司马懿的狡诈阴忍行为来看,这种推测不无道理。

曹操对司马懿放心不下,总想对他有所行动,但是,曹丕“素与帝善,每相全佑”^{[1]20},曹操找不到下手机会,后来,见司马懿甚为勤恳,又见太子甚重用他,也就不再追究了。建安25年(220),曹操病死。司马懿终于躲过因曹操猜忌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祸。

在曹丕、曹睿时代,司马懿开始大展羽翼。曹操死后,曹丕并未把其父的警告放在心上,反而重用司马懿。司马懿也不负曹丕之望,功绩卓著。黄初二年(221),司马懿升为侍中、尚书右仆射;黄初五年(224),转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

曹丕做了7年的皇帝,曹睿做了15年的皇帝,在这两位帝王当政期间(220—240),司马懿成为国家的重臣,得到了两任皇帝的充分信任。黄初七年(226),曹丕去世前,“(司马懿)与曹真、陈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1]4}。可见曹丕对司马懿是十分信任的。

太和四年(230),司马懿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官位再升。曹睿临终,以手诏召之,“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手诏曰:‘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闥入,视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卧内,升御床,帝流涕问疾,天子执帝手,目齐王曰:‘以后事相托。死乃复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1]3}。曹睿说了上面的话后,“又教齐王令前抱宣王颈”^{[2]114}。这说明曹睿对司马懿的亲近信任程度之高。

也就在这两任皇帝在位期间,司马懿不仅掌握了军权,而且其地位也日益上升,在魏的威望也日渐加重。

曹丕和曹睿时代,司马懿虽然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丕、睿却依然控制着国家大权,故此,曹魏的皇权并没有位移。在这一段时间,司马懿对曹氏家族,似乎一改从前的鄙视,而是忠心耿耿,为大魏的国防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主

要表现有三：一是扑灭辽东公孙渊的反叛；二是对付诸葛亮的进攻，使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成为泡影，同时灭掉反复无常的孟达；三是反击东吴与蜀的联合进攻。

也就是在这两位皇帝在位期间，司马懿攒足了政治资本，同时也网络了一批反魏亲信。所以，在这个时期，司马懿虽然是在为魏国东征西讨，却也是在为司马氏家族奠定篡业根基。

在齐王芳时代（240—254），司马懿已成为为魏国四朝效劳的顶级元老，举国大事，无不参与，作用之大，无与伦比。也是在齐王芳为政时代，司马懿又受到数次嘉奖。但是，司马懿对曹氏家族的看法却没有从内心深处改观。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篡魏的实践工作——或可以说，是一种对曹操的复仇计划。

三、司马懿恩将仇报孤注一掷进行复仇

司马懿大权在握，必定与曹氏皇室宗族集权产生矛盾，此矛盾在正始年间不断加剧。作为同受遗辅政的托孤大臣，他与曹真之子、宗室曹爽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在矛盾公开化的第一阶段，曹爽取得胜利。司马懿被小皇帝提升为太傅，名义上升了官，实际上却失却了实权。司马懿也因此谢病不朝。

可是，司马懿并不甘心闲赋。照理，这时的司马懿，已是快70岁的人了，完全可以在家颐养天年。但是，他有更大的目标。他与几个儿子和亲信们在暗中寻找机会。为了欺骗曹爽一党，在曹爽的亲信李胜来访时，司马懿装聋扮傻，泪花潸然，竟然骗过了李胜一帮笨猪。这种行为对一般人来说，很难做到，但司马懿却做到了。

《三国志·夏侯氏传》注引《魏末传》：

“宣王令两婢侍边，持衣，衣落；复上指口，言渴求饮，婢进粥，宣王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愍然，为之涕泣，谓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赖明公。然众情谓明公方旧风疾发，何意尊体乃尔！’宣王徐更宽言，才令气息相属，说：‘年老陈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恐不复相见，如何！’胜曰：‘当还泰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阳为昏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爱！’错乱其辞，状如荒语。胜复曰：‘当泰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谓胜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刺史，盛德壮烈，好建功勋。今当与君别，自顾气力转微，后必不更会，因欲自力，设薄主人，生死共别。令师、昭兄弟结君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区区之心。’因流涕哽咽”^{[1]285}。

为什么司马懿竟然可以做出如此不耻之举？目的就在于迷惑对方以利于篡权复仇。

在矛盾公开化的第二阶段，司马懿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正始十年（249年）正月，曹爽带着小皇帝去高平陵祭祀先皇，司马懿父子乘机发动事变，一举彻底消灭了曹爽

集团。这次事变，司马懿父子手段极为卑劣，这是其政治人格发生质变的一个关键事件。

高平陵事变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司马懿弄出一个“洛水之誓”。《晋书·宣帝纪》中记载得十分清楚：“（爽）夜遣侍中徐允、尚书陈泰诣帝，观望风旨。帝数其过失，事止免官。……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谕爽，指洛水为誓，爽意信之”^{[1]18}。

洛水之誓是一派胡言。因为形势很明显，当时，司马懿手中没有皇帝，京城军队也不会完全听其指挥。如果曹爽听从了桓范之策，“奉天子幸许昌，移檄征天下兵”^{[1]17}，司马懿就会受到灭族之灾。可是，蠢猪般的曹爽并没采纳这一正确计策。在曹爽放权后，司马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很快就找个谋反的罪名，把曹爽一党诛杀，并夷三族。

司马懿父子屠杀曹爽一党时，蒋济要求为曹真留一个后人，说：“曹真之勋，不可不祀。”曹真当年与司马懿共事，对司马懿很是敬重。但是，司马懿根本不念旧情。蒋济因感到自己对曹爽食言，羞愧而死。史载：“初，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1]2456}。

在高平陵事变中，还有一个细节必须说明：这就是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民间，至高平陵事变，一朝齐聚。这是一支很可怕队伍。三千死士，首先，可以肯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其次，史书说，这么多人，养在民间，竟无一人知其归司马师所有；再次，也无人知道他们从何地而来。可见司马师的隐匿谋划非同一般；而且，养这三千人，需要一大笔资金，也无人知晓如此巨资从何而来。这说明，司马懿早已处心积虑要夺取曹魏的皇权。

从这个事例，也足以证明，司马懿要篡权的准备时间很长，可能在魏明帝时代就有所表露。因为魏明帝也已怀疑过司马懿，曾问大臣陈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回答：“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3]2282（卷72 魏明帝太和六年条）}。说明陈矫也不敢肯定司马懿是否对魏氏真心忠诚。明帝问此话，可能是直觉中对司马懿不太放心，但似乎此话又是随意出口的，因为他以后对司马懿照旧信任。但是，在一些大臣的心中，至少司马懿为人行事心地难测。

高平陵事变的成功，表明司马懿已完全控制了曹魏中央政权，并迈出了对曹氏复仇的关键一步。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在称帝之时，发出的诏书明确向天下公告说，大晋的洪业，是他爷爷奠定的根基：“昔朕皇祖宣王，圣哲钦明，诞应期运，熙帝之载，肇启洪基”^{[1]51}。其实，也就向世人明说了，他的爷爷不是大魏的忠臣，而是大晋的创始人。

四、司马懿之子对其卑劣复仇心理和人格的继承及其影响

高平陵事变二年后，司马懿扑灭了太尉王凌的反抗，并以皇帝之命，逼杀了楚王彪。复六个月后，得病而死。司马懿以毫耄朽躯，孤注一掷，完就了曹魏实际政权向司马氏的转移。但是，这时司马氏并没有完全消灭拥曹势力。毕

竟,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部分人依旧对曹魏充满了感情。这是司马氏必须解决的问题。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掌握了曹魏的大权。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废皇帝曹芳。正元元年(254年),他以谋逆罪诛杀李丰、夏侯玄等,皆夷三族。与其父狡诈凶狠如出一辙。正元二年(255年)正月,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反,司马师抱病带兵平之,随之而死。其弟司马昭接掌曹魏大权。司马昭在任作了这几件大事:

一是公开杀害魏帝高贵乡公曹髦。公开弑帝,此前历史绝无先例,故引起正直人士极大反感和对魏帝的同情。名臣陈泰抱曹髦之尸放声痛哭;连司马昭之叔司马孚也对弑帝行径十分不满。后来,在魏帝禅退时,声称,自己死后,绝对是大魏的纯臣。尚书王经被收,“辞母。母颜色不变,笑而应曰:‘人谁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2]305} 注引《汉晋春秋》王经就诛时,其故吏向雄失声痛哭,哀动一市。可见当时人心所向。二是平诸葛诞之反。在这场“平叛”中,诸葛诞的不少部下宁死不降,史称是因为受诸葛公之厚恩,实则还有对司马氏人格的不屑和鄙视。三是灭蜀和平定钟会之乱。

这三件事,灭蜀受到称道,而弑帝却为世人所轻蔑,并成了司马氏政治人格的最大污点。如此一来,司马懿父子留给后代的“政治财富”,只有卑劣的政治人格示范。

司马懿之孙司马炎在汉末大乱百余年后,复统一了中国。但是,和当年刘邦建汉统一相比,其政治人格就相差远矣。刘邦的子孙,以刘邦的伟大功业而自豪,后代复有文帝、景帝、汉武、光武等帝,更为其后代和社会上下传颂之榜样。可是,司马懿父子数代人的可耻,让其后代无血亲榜样可倚,无伟大祖先可夸。其卑劣的复仇行为虽然赢得了政治上的暂时胜利,却也收获了卑劣复仇心理和卑劣政治人格的苦果。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曹丕父子二代对其极为信任,皇恩浩荡,可是,司马懿却恩将仇报,哪里还有一点忠臣的形象?夺权的做法,更令人齿寒。这就使司马氏皇族在整个国家的道德地位,似乎还低了高等士族一等,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和敬畏,皇帝的崇高神圣性不复存在。这个表面服膺儒学的家族,一直在破坏儒学所建立的政治人格,就这样陷于政治人格和政治道德的绝境之中。

晋王朝建立之前,从司马懿掌握曹魏大权时起,便有人对司马懿父子卑劣行为不满,而不顾灭族之灾,奋起反击。先有“淮南三叛”,再有钟会之叛。“淮南三叛”的领导者是忠曹实力派,他们反抗合情合理,而钟会之叛却有点不可思议。统帅灭蜀大军的主帅、魏朝司徒钟会拥十多万大军,于灭蜀后矫郭太后诏,起兵反司马昭。钟会先为司马懿看重,又为司马昭的心腹,平淮南毌丘俭、诸葛诞之叛,立功居多,又潜杀忠于魏室的嵇康,但却仍为司马昭所疑。钟会之叛,从一定意义上讲,也说明钟会本人对司马氏

统治的惧怕。司马氏与钟会,尽管沆瀣一气,并没有建立起真诚的施恩报恩体系,有的只能是互相利用并互相怀疑。

晋武帝死后,随着八王之乱的扩大,全国各地开始发生频繁的暴动。至东晋,在国家政权内部,先后有王敦、桓温、桓玄、刘裕等覆晋势力。这几个权臣皆是想取晋而代之的枭雄,均是社会上层中的实力派代表。晋皇帝对他们施恩不可谓不重,可他们为何还一心要代晋称帝?皇帝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他们心目中一钱不值。同理,晋皇帝与他们也没有建立起真诚的施恩报恩体系。

由此可知,汉代以来建立起的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中最为重要的忠孝观与恩仇观,在受到曹操父子破坏之后,复为司马氏以更为卑劣的手段破坏。司马懿父子以卑劣复仇的方式与人格夯筑的大晋王朝的根基之牢固性甚差,其父子之人格的恶劣示范效应,至其后代也未能消弭,这就导致司马氏不能得到社会心理广泛的认同,从而使社会上有的人不惜冒灭族之灾而反之。

后人论西晋灭亡原因,多在用人 and 制度——晋武帝接班人和八王之乱上下功夫,却少及晋王朝建国的根基问题。诚然,愚蠢的接班人和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西晋的覆亡。但是,追根寻源,事实上,在晋王朝立国的根基中,已经埋下了早亡的种子。事实上,晋王朝的实际建立者——司马懿,以其卑劣的恩仇观念,以复仇的方式夯建的晋王朝根基从未坚实过。史载:“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1]20} 惊骇羞愧之极!连司马睿自己在心灵的深处已极为自惭,对祖宗的复仇行为感到可耻,更毋须说社会其他人群了。

综上所述,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司马懿眼中,曹魏政权对自己无恩可言,曹操强迫自己出仕,并对自己时有所忌,时想加害于己,也就形成了一种潜在的仇恨。所以,自己对曹氏家族也无报恩可言,而有的只能是复仇心理。因此,尽管曹丕父子对其钟爱有加,施恩多多,但是,在司马懿和曹氏皇帝之间,却没有形成赐恩和报恩的忠诚关系体。司马懿的复仇心理和行动为其子孙树立了卑劣的人格示范,这就使得其子孙的政治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卑劣和可耻,也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得不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支持,从而无法夯筑牢固的立国根基,西晋之早亡与东晋内乱频繁,寻根穷源,多与司马懿恩将仇报式的卑劣复仇行动有一定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6.

责任编辑 文方